

# 钱基博的文学史观与新文学观

## ——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化解读为中心

李向阳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后,受到新旧文化阵营截然相反的评价,原因有二:一是各家现代文学史观的差异,二是新旧文化阵营的彼此发难。借助《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表达了“观其会通而明进化”的文学史观,以及新中有旧、形态驳杂的新文学观。钱氏新文学观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学史》对新文学图景的描绘,而立足旧文学的视角又使其对新文学家在主观上呈现批判的态度。从文化的层面说,坚定的中国立场和对全盘欧化的隐忧,是《现代中国文学史》讽诫新文学和新文化偏颇倾向的深层原因,也是该书“白话文”一节受到制约与简化的内在理路。将《现代中国文学史》置于中西文化相互制衡的时代背景中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钱基博挽颓淑世的知识分子情怀、了解新文学家批驳本书的有失公允之处。

**[关键词]**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文学史;新文学;文化解读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5-0093-06

钱基博积十余年工夫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后,陈豪楚、穆士达、胡先骕等人分别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图书评论》《青鹤》等刊物发表评论文章。由于各人所持立场有新旧的不同,加之当时新文化阵营的锋锐与旧文化话语的衰歇,这些评论文章明显分为两派。各家立论总体上对回护旧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非难多而褒扬少。1943年,文学史家陆侃如发表《评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文,其结论是:“对新文学不能下公平的判断,对旧文学不能有深入的认识,这是钱先生的书两点最大的遗憾。”<sup>[1]65</sup>这基本延续了十年前新文学家的看法。应该说,站在新文学、新文化立场上的评论家,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驳,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部分;然而他们难以完全做到在同情与理解基础上的平心静气、客观公允,这也毋庸讳言。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钱基博的文学史观与新文学观,探究《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策略的真实意图,并在中西异质文化碰撞制衡的背景中体察钱基博忧时淑世的知识分子情怀,以及新文学家批驳本书的有失公允

之处。

### 一、观其会通而明进化： 钱基博的文学史观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明确地阐述他的文学史观曰:“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sup>[2]5</sup>又说:“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sup>[2]8</sup>见历代文学之动变而观其会通,可视为钱基博文学史观的基石。面对欧洲思潮澎湃东渐、人主出奴的现实,钱基博批评了当时衡政论学、必准欧西的“骛外”倾向,以及茹古乖今、食古不化的“执古”行为。钱基博的主张是:“文学为史,义亦无殊;信而好古,只以明因;阐变方今,厥用乃神;顺应为用,史道光焉!”<sup>[2]8</sup>也就是说,文学史的稽古,是为了藏往知来,明白今日文学之所由来,以便知其今后的发展变化。顺应历史的发展,是钱基博文学史观的重要特征,也正是“阐变方今”“顺应为用”所表达的意涵。清儒焦循曾有“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

**[收稿日期]** 2019-05-10

**[基金项目]** 河南大学“中国近代文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项目编号:2019CXTD005)。

**[作者简介]** 李向阳(1993-),男,河南商水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

的经典概括,这句话若作为钱基博文学史观在内容层面的生动提炼,同样熨帖。

1952年6月至8月,钱基博作《自我检讨书》。在这篇历时两个多月写就的长文中,钱基博说:“人家说我思想顽固;其实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从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sup>[3]65</sup> 1898年,12岁的钱基博在父亲的教导下,订阅《申报》,了解时务,又在《格致新报》上读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觉得耳目一新,从此对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年轻时期的钱基博从生物学到算学,从物理化学到植物学,求知范围广泛,乃至“舍弃经史,认为不切时务”<sup>[3]65</sup>。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的伴着当前的环境,有的跟着时代的演变,我把握住时间空间,从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sup>[3]66</sup> 因此可以说,钱基博是具备随时变化、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的。对于身处的时代、社会的各种思潮涌动,钱基博并非深闭固拒,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了解适应。所以,对“现代中国文学”,钱基博会作出“当代之文,理融欧亚,词驳今古,几如五光十色,不可方物!而要其大别:曰古文学,曰今文学,二者而已”<sup>[2]267</sup>的全面立体性描述。相较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钱氏此论有其更为客观允当的一面。

由了解时务、阅读《天演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而奠定的时代进化思想,是钱基博文学史观的核心。基于进化的文学史观,钱基博对晚清文学的时代特征以及新文学渊源作了如下论断:“迄于清季,词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sup>[2]12</sup> 晚清文学,是中国文学面对古与今、中与西两大时代主题而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谓“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是说晚清文学尽罗我国数千年来发展延续之文学各体式,缩演于数十年间,为变动不居的旧文学作一收束与总结。而新文学的产生,则得益于晚清文学的蜕化开先作用。这已基本得到业界的认同。钱基博对晚清文学的判断和对新旧文学转型的认知深刻精当,显示出超拔卓绝的历史眼光,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观其会通而明进化”的文学史观,使《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体例与写法上独具一格。先“文”后“诗”,继“词”终“曲”,是古文学在钱基博心目中的排序。“文”包括魏晋文、骈文、散文(包括古文翻译);“诗”则分为“中晚唐诗”与“宋诗”;“词”重点介绍朱祖谋、况周颐,附王鹏运、王蕴章诸人;“曲”则重点突出王国维、吴梅的开创地位而附以童斐、王

季烈等。这样的体例编排是钱基博取法史书《文苑传》的结果,所谓“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仅仅认为钱氏此著类同儒林文苑,篇各独立,那就难免偏颇。一则《现代中国文学史》奉行史家“激射隐显”的笔法,需要多部分参照阅读才能看出作者的综合评判,这是借鉴司马迁《史记》书写人物的技巧;二则每部分之间筋脉通连、环环相扣,往往后一章要介绍的对象会在前一章自然提及而略其迹,读者每每不易察觉。同一部分的不同叙述对象之间的过渡,更见钱氏文章手法的高明。如第四部分“曲”在即将由王国维转到吴梅时,便运用了对比互见的方法:通过一段持论宏通、精炼透辟的概括性文字,水到渠成地过渡到下文对吴梅曲学研究的介绍,引人入胜。类似的例子尚有许多。

虽然书名“文学”史,钱基博却在著述时充分吸收小学、史学乃至经学的成功经验,融会贯通,冶于一炉。而他在文学史写法上的诸多尝试、探索,也使得《现代中国文学史》具有形式与内容层面的双重独特性。同时也不得不提,虽然本书在语言上采用古文,且大致主于详文言而略白话,但是这部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史著,仍然由于吸收了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以及文学随时演变的进化理论,而在古色古香的外表下不时透出现代精神文明的幽光。

“观其会通而明进化”的文学史观,使钱基博在论述古文学时洞若观火、切中肯綮,源流正变了然于胸,是非得失剖判明白。如其述王闳运七言近体尤为擅场时,引其《雪霁登玉皇顶》并评曰:“雅健雄深,颇似陈卧子,有明七子之声调而去其庸肤;此其所以不可及也!”<sup>[2]54</sup> 深得王闳运此诗神髓。然而,当其述及新文学,尤其是胡适的白话文时,则辞寓规讽、语含讥弹,持论并非尽都客观平允。论者以此称钱基博为顽固守旧、不晓时变,不能如实反映新文学发展积累的骄人成绩。通过前文的评述可知,此论虽有一定道理却也并非完全准确。那么,钱基博的新文学观究竟如何?钱氏进化的文学史观为何在白话文这里发生折返?他对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讽诫态度究竟出于什么考虑?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下文一一解答。

## 二、新中有旧,形态驳杂:

### 钱基博的新文学观

在正式论述钱基博的新文学观之前,有必要就其对待白话的态度作一简单的分析。

钱基博在情感上倾向文言,但可以接受并使用白话,只是觉得白话“也有缺点和不便推行的所在,须得要改良”<sup>[4]1</sup>,而改良的目的是使白话在表达上更加经济、规范、有条理。他论文言与白话之别曰:

文章好丑,在意境上分别,不在形式。意境好,就是语体文,也尽有爽心豁目动人看的地方;意境不好,越是文言,越觉得乌阵涨气讨人厌。这是可断言的。况且语体文与文言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是句式。如果讲到作文的层次,不能不分个先后;词气不能不有个抑扬顿挫。这是根于语言姿态自然的需要,语体文与文言一样的。所以我认语体文也是文章的一种,既然不是老师宿儒深闭固拒的态度,也就不像现在一般自命新文学家的空想武断。<sup>[4]2</sup>

从文章意境好坏而不是语言形式的角度评判文言与白话的优劣,这是钱基博的公允之处,也是其开明之处。在《语体文范·例言》中,钱基博自言,他对白话文的非难,并不是林琴南、姚叔节等人式的以古文义法衡量白话文,而是根据他日常做白话文的经验。基于此,可知钱基博对白话的意见大多是从语言本身出发,不过他的参照物是文言,这一点也需指明。

明白钱基博对白话和白话文的态度,接下来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他的新文学观。《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新文学》分三部分:“新民体”述康有为、梁启超,附简朝亮、陈千秋等;“逻辑文”述严复、章士钊,附黄远庸;“白话文”述胡适,附周树人、徐志摩等。如果按照现代文学体系对“新文学”的界定,《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只有“白话文”可算得上真正的“新文学”,而所谓“新民体”“逻辑文”只能划归到“旧文学”的阵营中去。即使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康梁的“新民体”和章士钊的“政论文”也属于已死或半死的“古文学”。那么,钱基博分“现代中国文学”为新旧的标准是什么?他的新文学观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钱基博所标举的“新文学”,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今文学”,一为“古文之创变”。钱氏在序中说:“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sup>[2]1</sup>在介绍“新民体”时说:“论今文学之流别,有开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为、梁启超;有创逻辑之古文者,曰严复、章士钊;有倡白话之诗文者,曰胡适。”<sup>[2]267</sup>故知“新文学”即“今文学”。然

而“今文学”家中,若康梁,若严复,均非民国纪元以后方才“显闻”。钱基博解释列康有为入“新文学”部分的原因为:“三十年来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sup>[2]267</sup>又解释列严复入“新文学”部分的原因为:“若论逻辑文学之有开必先,则不得不推严复为前茅;叙章士钊而先严复,庶几先河后海之义云。”<sup>[2]351</sup>因此,钱氏所谓“新文学”,除包括显闻于民国纪元以后的“今文学”——章士钊“欧化的古文”与胡适“白话文”外,同时还将“古文之创变”,即梁启超“新民体”以及开梁启超、章士钊文章先机且崭露头角于清末的康有为、严复二人的文章囊括在内,而数千年虽代有嬗递却能各占一代之所胜的文、诗、词、曲等中国文学的传统文体,则被归入“古文学”的行列。

将钱基博的新文学观作以上理解,只能算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作为一部曾经被现代评论家点评为“名不副实,充其量,只可算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sup>[5]33</sup>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它在“新文学”部分写了什么,还需要知道它没写或没有充分写什么,即遭致新文学家非难的所在,如此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钱基博的新文学观。

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针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新文学”部分,持新文学立场的评论家分别从哪些方面对它表示了不满:

——至于小说作家与作品,从“五四”以后,种种文学的变动,却是一字不提,大约作者都摈斥如不足登文学的园地吧?否则,在民国二十二年出版,标明为现代中国文学史者,竟把他们抛到脑子后面了呢?<sup>[6]</sup>

——所以要讲新文学运动的各个方面,不能不注意到许多集团,例如新青年社、语丝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太阳社……但是它们的经过怎样?背景如何?思想根据在何处?曾受哪几国的影响?作风怎样?他都茫然无知,而又不想求知。<sup>[5]36</sup>

——本书所谓“现代”,是指民国元年至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不消说,白话的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是文学史上主要的部分。不幸钱先生对白话缺乏同情,也就缺乏理解。<sup>[1]64</sup>

关于以上三种代表性观点,本文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回答:

其一,对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社团,钱基博并非茫然无知,也并非不想求知。《现代中国文学史》“白话文”部分除论述胡适、周树人、徐志摩外,还论及郭沫若、郁达夫、蒋光赤等人;而所提及的新文学社团有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国际文化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普罗诗社、社会科学家联盟;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各体裁各领域;对各家文学创作的取法、造诣、倾向、风格等也都有精辟的断语。钱氏的评价并非完全平允,却独具只眼,深刻精警,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

其二,钱基博并非对白话缺乏同情,也并非缺乏理解。联系前文可知,钱氏虽在感情上回护文言,但并没有拒绝白话。而且,钱基博的诸多演讲稿,如《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方法》《国学之意义及治国学方法之评判》《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等,以及他1920年作的《语体文范·例言》和1952年作的《自我检讨书》,运用的都是条达通顺的白话文。他评周树人的小说“工于写实,所为《阿Q正传》,尤为世所传诵”;评徐志摩的诗“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又评以郭沫若、蒋光赤为代表的普罗文学“其精神则愤怒抗进,其文章则震动咆哮,以唯物主义树骨干,以阶级斗争奠基石;急言极论,即此可征新文艺之极左倾向”,等等。<sup>[2]448</sup> 辨章考镜,鞭辟入里,都有相当的见地。

其三,钱基博的新文学观以旧文学为参照,他对新文学创作状况的审视也立足旧文学,这就使得钱氏笔下的新文学图景不同于新文学家心目中的设想。《现代中国文学史》虽然题名“现代”,但占据全书大半篇幅的“古文学”部分所收录的作家,大都成名于晚清,有的甚至以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正朔,然而钱基博仍然将他们写进本书。其意流连旧文学,对旧派作家再三致意,透露出明显的亲古疏今倾向。所以,虽然钱基博对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社团流派,都并非熟视无睹,但在他立足旧文学的审视和判断下,关于新文学的叙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制约与简化。因此我们说,丰富性、系统性的欠缺(而非“缺乏理解”与“茫然无知”),才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新文学”部分真正的不足。

综上所述,可以对钱基博的新文学观作出如下概括:一、基于进化的文学史观,认同白话文为文学之一种,且有独到的理解与判断;二、旧文学的立

场,使其对新文学的认知发生疏离,并在主观上呈现批判的态度;三、对旧文学的回护以及对现代新文学在客观上的承认,使其新文学观呈现出矛盾而复杂的形态。

钱基博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家讽诫揶揄,除了旧文学立场的制约使其不能精确评估新文学的时代价值以外,还存在中西文化冲突制衡的深层原因。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们将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将们对全盘欧化的极力提倡,使坚守中国立场的钱基博对民族文化的前途深感担忧,进而影响到他对新文学的客观评价。“观其会通而明进化”的文学史观,面对民族文化沦亡的隐患,唱出了谨慎而保守的调子。

### 三、中国立场,忧时淑世:

####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化解读

《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内容层面会带给读者一种直观感受,即它是为批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作。在《绪论》部分,钱基博说:“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sup>[2]4</sup> 而在下编行文即将结束时仍对胡适耿耿于怀,以新青年讥诮胡适落伍的现象为口实,语露微词,意含讽诫。基于现代文学史观的不同,钱著确实有于胡著之外别张文学史书写范式之一军的目的,但这显然不能构成前者成书的全部现实因素;在文学史观之上,两人文化立场、思想主张的分歧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钱基博在《自我检讨书》中说:“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西洋人的文化侵略,只有降服之一途;绝不承认民族文化!”<sup>[3]66</sup> 而其自述《现代中国文学史》撰写缘起的一段话,更能加深我们对本书内在精神的认知。钱基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时,面对学生只知学习英文而不知学习国文的行为,情绪激愤地说:

诸位,毫无问题是中国人!然而诸位一心读英文,不读国文;各位的心,已不是中国人的心!……我想诸位家里,花了五百元一年,卖掉你们做外国人!我想诸位祖宗有知,在地下要哭!我今天已不是圣约翰雇佣的一个国文教员;而是一中国父老的身份,看你们作子弟,挽你们的心,回向中国!我想你们不愿,也得愿;因为你们身里有中国人的血!……我写

《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圣约翰时起手。<sup>[3]70</sup>

所以本文认为，坚定的中国立场以及对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化渗透的担忧，才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最内在的原因，而不仅仅局限于现代文学史观的不同。而这也为我们理解钱氏孜孜矻矻以作《〈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及《十年来之国学商兑》等著述，在文化层面提供一种解读的启发。全社会追逐新文化以致摈弃传统的残酷现实，使钱基博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对中国青年的文化传承问题进行了反思。因此，钱基博对胡适最大的不满，乃在于后者主张全盘西化的极端方式。钱基博认为，新文化运动截断众流、标新立异的种种举措，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面临沦亡的危险，使中国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背心离德的倾向，这无异于在中国培养外国人，其弊端不可小视。钱氏以国学传承自期，乃至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大书古文学，根源于他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感时淑世的责任意识，以及对古文学价值的笃信。新文化运动摈弃传统的激进方式，则在客观上构成本书借旧文学发难新文学的现实原因。

1936年2月15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齐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集中展示新文学运动十年来的成绩。同年9月，《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本随之问世。在增订识语中，钱基博说：“今吾侪小民，呻吟憔悴于新政之下，疾首恫心，求死不得；末学小生，叫嚣跳踉于新学说之中，急言竭论，迷复何日。”<sup>[7]</sup>可谓言出肺腑，痛心疾首。当新文学、新文化运动陶醉在“破坏”的快感之中而建设不足时，钱基博目睹时代声气转移、高文动俗、惟乱是闻，他愿以旁观之冷眼为社会献一剂清凉散。因此，从根源上说，《现代中国文学史》乃是中西两种文化在特定环境下磨合制衡的产物。钱氏此著立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在阐扬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重要价值，而以受欧化影响的文学、文化为异态。《现代中国文学史》不仅是一部文学史，同时具有超出文学范畴而上升到文化层面的独特意义。在欧化大潮铺天盖地、汹涌澎湃之时，钱基博退处声气之外，对中国文化、中国立场表现出孤耿笃定的坚守与自信，并以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讽诫新文学、新文化的偏颇，却无可奈何地被时人讥为“思想顽固”“不晓时变”，实在有失公允。

新文学家狂飙突进的行为方式和非此即彼的

思维理路给文学界、文化界带来的震荡，使一位秉持进化文学史观的大家，在认可并理解白话文的同时对旧文学产生无限怀念。面对不可阻遏的欧化趋势，信古好古且又真正知古的知识分子钱基博，开出了“改良、调和、共存”的药方，试图为旧文学、旧文化争得一席之地，其说详见《现代中国文学史》“章士钊”一节。这里仅举本节论法国共和政体新旧两党并存国会之事为例：

时则建国诸贤，深明治体，对于尊王反动之徒，不加压迫，转与提携议会之中，君政党公然列席，初为多数，逐年递减；至今日仍存二十余席焉；如此优容，转不闻共和为其所坏。此诚一孔之士，所不可解；而明理之夫以为自然者也！<sup>[2]405</sup>

言在此而意在彼，而又难免一厢情愿。只是新文化的战士们并不理会，钱基博的愿望也只能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变成牢骚，无关痛痒地自我言说。直至1952年，钱基博仍然不能忘情地说：“新社会何必不与旧道德一致。”<sup>[3]66</sup>不过他也清楚，时代、社会总会发生变化，所以他在1954年对人说，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虽然还可以翻翻，但却不得不承认“已经过时了”。<sup>[8]</sup>一位历经沧桑、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晚年依然能够洞察时代演化的现实铁律。

#### 四、结 语

1986年，岳麓书社再版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李书磊、金克木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发表评论，对钱氏此著的认识渐趋于冷静客观。2004年，上海书店再版此书，《文汇报》《文汇报读书周报》相继刊登评论文章，从正面肯定并赞赏《现代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书写以及作家作品分析方面的重要贡献。郭延礼在《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中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批评方式虽旧一点，著者的评论也相对少一些，但该书史料丰富，旁征博引，重视知人论世，有些评论也很有见地，颇具‘史实’。”<sup>[9]</sup>总体概括出此书的优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被现代评论家定性为“顽固迂腐”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不断得到再版与“重读”。事实表明，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与定位，逐渐摆脱主观情绪化特征，努力作出在同情与理解的基础上还原本书真正价值的探索。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伴随五四运

动而高歌猛进的新文化运动,更在破旧立新中使中国文化实现涅槃重生。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方式有其时代的必要性,然而后人在纪念这场运动所取得的辉煌功绩时,同时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反思。《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新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反思在学术领域的映射。胡全章曾指出:“这部见解卓特、别具一格的文学史著作,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被误读、曲解和贬抑的状态。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得不说,要透彻地理解钱先生这部大著的文学史精神与内涵,还需要时间。”<sup>[10]</sup>站在“五四”百年的时光轴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 [参 考 文 献]

[1] 陆侃如. 评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J]. 文艺先锋, 1943(2):60.

- [2]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上海:世界书局, 1933.
- [3] 钱基博. 自我检讨书(1952)[J]. 天涯, 2003(1):65—78.
- [4] 钱基博. 语体文范·例言[M]//钱基博. 语体文范. 无锡:无锡县公署三科, 1920.
- [5] 马玉铭. 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马玉铭先生的批评[J]. 图书评论, 1934(10):25—30.
- [6] 王旬. 评钱基博之《现代中国文学史》[J]. 众志月刊, 1934(1):58.
- [7]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上海:世界书局, 1936:3.
- [8] 姜弘. 综贯百家洞流溯源——重读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J]. 书屋, 2007(12):28.
- [9] 郭延礼.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64.
- [10] 胡全章. 晚清小说与文学转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76—177.

(责任编辑:程晓芝)

## Qian Jibo's View o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New Literature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Xiang-ya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Qian Jibo's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1930s) has been quite differently evaluated by the old and new cultural camps. Qian Jibo expressed his view on literary history as “evolution is evident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ew form and the old form. Qian Jibo's new literary view was elaborate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a critical attitude based on the old literature to the new writers can be found. The firm 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hidden worry about complete Europeanization is the deep reason for his critique and bias to new literature and new culture. Such stance also explains the rationale for the restric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 “Vernacular” section in the book. 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Qian Jibo's intellectual compassion of saving the decadence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Qian Jibo;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